

对中国翻译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读邹振环《20世纪中国翻译史学史》

■ 熊兵娇

现代意义上的翻译史研究发展到今天,已经历了100多年的发展过程,晚近30余年,翻译史研究的势头更是有增无减。如此一来,为了回应翻译史研究发展的需要,对中国翻译史研究的历史进程进行清理与回顾就显得尤为必要。邹振环的新著《20世纪中国翻译史学史》(以下简称《史学史》),就是对中国翻译史研究在20世纪的形成与演进的历史性回顾与反思。作者把中国翻译史学的研究内容分为“中国翻译史学原理”和“中国翻译史学史”两大部分,如书名所示,他所关注的是后者。具体而言,《史学史》是“对20世纪中国翻译史研究的成果作出一次比较系统的再总结和回顾,提示一条20世纪形成和发展的翻译史研究的谱系”。

纵观整个译学界的研究现状,翻译史学史似乎并未引起学人的兴趣和关注。以翻译史实践为对象的系统性专题研究,严格说来,在《史学史》面世之前是空缺的。显然,《史学史》所做的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也是对20世纪学术史的有益补充,“填补了20世纪史学学科研究史上的一大空白”。《史学史》立足于“描述、批评与反思”的研究路径,为勾勒与重现、分析与评判20世纪中国翻译史研究的本体面貌与脉络演变做出了积极的探索和有效的实验。

作为学术研究史,《史学史》

的首要任务是要对20世纪翻译史研究的历史进程加以概括,并对其作出系统的描述和梳理,这就必须构建内部结构,也即各个构成部分的组合关系。针对这一问题,需要考虑两层关系,即横向的空间轴系和纵向的时间轴系。作者在横向选取内地、香港和台湾三地的翻译史研究为考察对象,在纵向上则以1902年为起点,将1902—2000年分为1902—1949、1949—1984、1984—2000三个时期;同时它又以时间为经,以具体的研究个案的主题为纬,一纵一横,一经一纬,构建起了《史学史》的叙述结构。

《史学史》立足于历史文献学的方法,采用知识史理论,以“起承转合”为演变轨迹,对百年中国翻译史研究作了共时性和历时性的纵横描述。在具体的描述方法上,它以治史者、史著、刊物、编纂形态、翻译史研究现象等“散点”来把握20世纪翻译史研究的发展脉络和基本特点。以“点”带面,在对“点”进行重点描述时,不忽视历史内部的照应与关联以及整体性流变。在横向的空间轴系中,《史学史》将内地、台湾和香港的翻译史研究并置于20世纪中国翻译史学史的整体架构中,展现了“中国概念的完整性”,由此形构了一部“全景式”的翻译史学史。

历史研究除对历史事实进行综合性的整理与描述之外,断然



《20世纪中国翻译史学史》
邹振环著
中西书局出版

不能没有价值评判。毫无疑问,《史学史》的贡献还在于它从史学批评的角度,重新审视了20世纪翻译史研究活动及其成果的学术价值。《史学史》把具有代表性的翻译史著(包括翻译史研究现象或事件)置于共时性和历时性的双重空间中,对百年翻译史研究的现状展开了局部性与整体性批评,检讨了20世纪中国翻译史研究的利弊得失。《史学史》坚持“务成囊美,毋薄前修”的批评态度,持客观公允的立场,实事求是、设身处地地作出评价,且做到要言不烦,点到为止。

运用历史研究的方法,《史学史》大致有三条批评路径:一是宏

观把握20世纪翻译史研究的学术流变,并以此确立翻译史著的历史地位;二是秉承古代学术批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传统,清晰呈现20世纪中国翻译史研究发展的一般形态,并确立翻译史研究各种趋势和潮流在历史演进中的位置;三是运用历史比较法,阐明20世纪翻译史研究的进程特点和翻译史著的优长短缺。

而在对20世纪中国翻译史研究展开描述与批评的同时,该书还对其进行了学理反思。这些反思不是凌空虚蹈,而是建立在对20世纪翻译史研究的历史进程与现状特点的全面把握与深度理解之上。

首先,《史学史》对20世纪翻译史研究的发展进程与内外动因进行了反思。从研究主体、研究规范、传统治史方法以及学术交流等因素反思了治翻译史的发起和发展,并从物质经济和教育发展的角度检讨了1949年以前翻译史研究系统性的缺失。在对20世纪中期中国内地翻译史研究的承势与转折的考察中,《史学史》就时代政治对翻译史研究趋势的影响作了深入剖析。与此同时,该书就同一时期台港翻译史研究的不同局面的成因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对于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末的翻译史研究,《史学史》分析了这一时期翻译史研究回归学术自身的自律性。20世纪最后20

年是中国翻译史研究的重要时期,《史学史》从史料开掘、研究方法、研究规范等方面思考了“多元格局”的治史局面的形成。

其次,《史学史》对20世纪翻译史研究的实践和理论问题进行了反思。一是研究主题的分布不平衡。《史学史》指出,20世纪中国翻译史研究已经形成了多学科、多层次、多角度的研究特点,但研究主题偏重佛典翻译史和文学翻译史,从而造成了研究整体格局的失衡。二是史料与史识的结合不到位。《史学史》认为,在有限的翻译理论史和翻译思想史研究著述中,大多长于叙述和对史料的梳理排比,缺少对史料的探究和升华。三是研究方法上缺少创新。《史学史》指出,20世纪翻译史研究缺少历史研究新方法的运用,多为“断线式珍珠”的传统叙述模式。《史学史》也触及到了翻译史研究的理论问题。它认为,20世纪初以来的翻译史研究在理论上并未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话语系统,翻译史尚未建构起属于自己学科的文献学。

再次,《史学史》对于20世纪翻译史研究对新世纪研究的启示也作了深入思考。它从新史料的挖掘、拓展、汇编与辑印,新理论与新方法的运用,以及翻译整体史与专门史的同步发展等角度,思考了21世纪翻译史研究的目标与方向。

法国贵族的传承与危机

——读《贵族:历史与传承》

■ 郑渝川

进入现代社会,法国的贵族阶层面临传承危机。这一阶层在1789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中失去了政治特权。1848年,革命进一步瓦解了贵族的社会影响力,剥夺了贵族的一切法律地位。尽管如此,法国仍然存在一个固定的贵族阶层,与平民大众拉开距离。而贵族传承危机的原因是,继承转让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出现家产分割。法国贵族最著名的标志就是居住在城堡中但城堡在房地产市场上的价格越来越高,一些贵族家庭分配财产很难筹集到与城堡等值的现金等资产。这种情况下,出售城堡开始成为法国一些贵族家庭的选择。一些城堡被卖给了海外的投资者或富豪,还有一些开始成为公益场所。

然而,更严峻的挑战在于,即便许多贵族家庭可以承担家产分配、古堡维护等方面的财务消耗,但这些家庭的年轻成员往往并不愿意继续居住在古老的城堡中。法国社会文化历史学家、巴黎索邦大学研究当代社会文化历史的史学教授埃里克·芒雄-里高在其所著的《贵族:历史与传承》一书中就谈到,持有城堡尤其是历史悠久、名声赫赫的古堡,需要雇佣和管理高水平的维护团队,“还有许许多多时间

上的束缚和精神上的负担:安装一套防止小偷的安防监控系统;时时刻刻警惕周边无处不在的噪声或视觉污染;精通各种关于古迹的法规”,很多时候还必须依法向公众公开——这就意味着,住在古堡,贵族家庭的私人空间得不到很好的保证。

《贵族:历史与传承》是里高花费了25年时间,经过持续不断地观察和史料收集,并探访法国贵族家庭而写成的。该书揭示,尽管贵族阶层而今已经成为平民大众的组成部分,但这个阶层仍然在努力维护其集体记忆和共同历史,这种努力也超越了贵族家庭、家族本身,而成为法国文化、欧洲文化的一部分。

全书开篇就指出,时至今日,法国的贵族阶层依然非常希望家族大厦永远延续下去,依据是其高度重视族谱,并保持着几个世纪以来的联姻传统。有意思的是,在法国大革命、1848年革命之后,贵族在失去特权地位后仍矢志不移地加入各种推动历史和考古研究的学术团体,并斥资编撰家族历史。这种家族史和族谱编撰的做法,如今受到了法国其他社会阶层人士的效仿,成为一项市场潜力可观的产业,甚至是“全民娱乐”。书中还谈到,法国

贵族还从比利时借鉴了家族协会,就是将拥有同一姓氏的人或拥有共同祖先的后裔都集中起来。

无论是法国大革命以前,还是之后共和国、帝国交叉出现的各时期,贵族阶层在这个国家都扮演着重要角色,特别是在失去法律特权后,贵族着力体现其在管理、政治、知识、经济等各领域中的优势。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法国贵族阶层的人口之所以占总人口的比例变得越来越低,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贵族阶层的年轻子弟慷慨奔赴前线,在那场残酷而漫长的战争中,蒙受了剧烈的人口减员损失有关(贵族人口死亡6%,平民死亡3%)。二战爆发后,尽管法国很快战败投降,却有相当数量的贵族子弟投奔戴高乐的抵抗运动。现今,法国贵族阶层的人士也在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尤其是慈善公益事业。书中对此解释说:“贵族的教育一直以来都建立在某一双重的原则之上:传承的责任和对比的义务。”

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是工商阶级在内的第三等级对以教士为主的第一等级和以贵族为主的第二等级发起的挑战。贵族阶层曾长期蔑视工商阶级,拒绝一切象征新



《贵族:历史与传承》
法埃里克·芒雄-里高著
彭禄娟译
三联书店出版

贵的符号。该书作者指出,这方面的文化传统一定程度上也延续到了今天,但随着现代市场经济特别是金融化经济的崛起,贵族所占有的社会财富比重下降,由此开始促成“法国名门世家和美国富家女子的联姻”,再然后,基于财富和身份的交换、联合,这一现象越来越普遍。当然,由此也出现了一个令人尴尬的问题,就是一些贵族过度渗入金融投机领域,从而给这一阶层的社会声誉造成了负面影响。

巴黎被称为世界浪漫之都,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法国贵族阶层成为时尚传统的坚守者和仲裁者。书中介绍了法国贵族品位的原则及其延续,叙述了贵族礼仪几个世纪以来如何删繁就简。尽管贵族文化在大众舆论中常常风评不佳,但平民出身的文化学者也会承认,贵族文化已经内化成为法国文化的一部分,成为区别于美式流行文化、商业文化的符号。